

1949—1986：“三转一响”生产与消费的口述史研究 ——以山东淄博为中心的考察

王 雁,张维杰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255000; 淄博盛康三转一响博物馆,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 “三转一响”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极具典型意义的轻工业产品。山东省淄博市作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较有影响的一个老工业城市,在“三转一响”的生产与消费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对相关口述资料等的梳理和考察,还原1949—1986年间淄博市“三转一响”的生产消费概况,可以具体而微地反映和呈现此一时期我国“三转一响”生产与消费的历史样貌。

关键词 “三转一响”;生产;消费;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 K27; F129.7(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09(2021)05-0151-10

DOI:10.14110/j.cnki.cn-37-1059/d.2021.05.017

“三转一响”系对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的形象称谓。它们又被称为“老四大件”,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极具典型意义的轻工业产品,也是当时全国人民最为青睐的高档消费品。时过境迁,前后风行30多年的“生活上品”如今已基本完成历史使命,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转变为工业文化遗产。认真梳理那个时期“三转一响”生产与消费的历史,有利于记录历史真实,保存文化记忆,展示民俗风尚,凝聚中国情怀,促进文化旅游业融合发展。

山东省淄博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有影响的一个老工业城市,在“三转一响”的生产与消费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为此,我们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先后深入所属各个区县,寻访相关人物近50位,搜集、整理各种资料1000余宗。本文拟以此为依据,通过“解剖麻雀”,对我国计划经济时代“三转一响”的生产与消费情况作一番深入考察。

一、“三转一响”工业产品生产情况

1.收音机生产

1953年,我国第一台全国产化“红星”牌502型收音机在南京无线电厂试制成功,从此结束了依靠进口散件组装收音机的历史,开始进行自主研制与生产。到1957年,全国年产收音机35万台。1963年,北京市试制成功晶体管收音机,定名为“牡丹”牌8402型。之后,晶体管收音机生产逐步取代电子管收音机生产。从1968年开始,中国掀起“大办无线电”运动,收音机产量有了很大提高,1970年的年产量超过300万台。1971年的年产量虽一度回落到240万台,但随后又逐年增长。1976年的年产量为

基金项目 本文系淄博市社科联等七单位联办百题调研重点课题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王 雁,女,历史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维杰,男,淄博盛康三转一响博物馆馆长。

969万台,1979年增至1387.5万台,1980年更是进一步增至3003.8万台^①。

淄博市在收音机的研制与生产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该市以收音机生产为代表的电子工业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1959年到1967年。1959年,山东省生建八三厂成立了半导体技术研究室,开始试制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器件。1962年,硅单晶和半导体三极管试制成功,由此拉开了淄博市电子工业的序幕。1965年1月,该市创建了全市第一批电子产品研发生产企事业单位。同年11月,淄博无线电元件研究所成立。1966年前后,淄博无线电元件研究所、淄博稀有金属研究所、博山无线电实验所、张店无线电厂等相继建成并投产,生产的产品主要有半导体二极管、半导体三极管、半导体收音机等。

第二个阶段,1968年到1978年。从1968年开始,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淄博市提出“大办电子工业”的口号^②。一大批电子企业仓促上马,全市厂点猛增到65个。但是各厂点生产的产品严重雷同,仅生产半导体二极管的厂点就有25处,从而造成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1972年,淄博市电子工业局成立,开始对厂点布局、产品结构进行调整,并加强了企业内部管理。调整后全市共有电子企事业单位20个、职工2489人、固定资产507万元。淄博无线电研究所、生建八三厂研究所,以及淄博无线电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七厂等8个单位成为淄博市电子工业的骨干企事业单位。

第三个阶段,1979年到1985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淄博市电子工业系统积极进行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1984年,市政府决定撤销电子工业局,成立电子工业公司,并对系统内的企业进行了全面整顿。1985年,淄博市电子工业生产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完成工业总产值10391万元,占全省电子工业总产值的14%;实现利税1058万元,其中利润682万元。

截至1986年,淄博市电子工业系统共拥有企事业单位39家,从业职工5800余人。在全国电子产品市场普遍不景气的状况下,全市电子工业公司直属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0588万元,比1985年增长1.9%^③。其中,淄博电视机厂(原无线电四厂)、无线电五厂、无线电六厂、无线电瓷件厂等都是山东省电子工业的重点企业,为国家科技进步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淄博市的多数电子企事业单位都生产过收音机整机或配件,并且都有引以自豪的业绩。比如淄博无线电六厂(原名周村电器厂)早在1963年7月就生产出淄博市第一台两管再生来复式电路半导体收音机,不过还没有来得及批量生产,就改产其他产品^④。

山东省生建八三厂于1965年5月试制出半导体收音机。该厂最初生产的是袖珍收音机,一年只生产几十台,销售渠道非常狭窄;随后生产便携式收音机,销售渠道依然不宽;最后改为生产台式收音机,“永恒”牌、“八三”牌、“鸿雁”牌是主要品牌,在全省范围内都有销售,销售渠道宽了很多^⑤。

淄博无线电四厂于1967年开始生产便携式和台式收音机。1971年生产出501型“卫星”牌五管便携式收音机,后又生产出“红卫”牌ZP-4A型四晶体管便携式收音机。1972年生产的“海鹰”牌六晶体管便携式收音机,次年在全国评比中荣获第二名。1981年生产的“双喜”牌8201型二波段交直流两用晶体管台式收音机,获全国第八届收音机质量评比三等奖^⑥。

淄博市收音机生产业绩最突出的当属淄博无线电七厂。该厂最初生产的是“向阳”牌收音机,1972年又试制成功了“宝灯”牌6101型六管一波段台式收音机。该厂当时的产品定位是面向农村、服务大

① 朱昶安《1949—1976年中国收音机的设计与演变》,北京印刷学院硕士论文,2016年。

② 《中国电子工业地区概览·山东卷》,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③ 《淄博年鉴(1987年)》,淄博:山东省出版总社淄博分社,1987年版,第220—221页。

④ 原淄博市周村电器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郭文魁之子郭浩口述,王雁整理。

⑤ 原山东省生建八三厂研究所技术员王同部口述,王尉伊整理。

⑥ 相关数据来源于淄博盛康三转一响博物馆,张维杰整理。

众,价格在全国同类产品中相对较低。因为产品质优价廉,市场需求不断扩大,该厂的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很多商家慕名而来,产品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极为畅销,销售最火的时候,拉货的车辆需要排队等上若干天。1980年,该厂年产收音机达16.7万台。1982年,在全国第八届收音机质量评比中,“宝灯”牌7201-2型七管一波段台式收音机获得三等奖^①。1986年,在市场调整、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宝灯”牌收音机的产量仍比1985年增长34.9%^②。从1984年到1988年,淄博无线电七厂的收音机产量在山东省的占比从36%提高到了98%,成为全省收音机生产绝对的龙头老大。

此外,淄博无线电三厂于1969年生产出便携式四管收音机,无线电五厂于1971年生产出便携式晶体管收音机。1985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淄博市电子行业逐步调整改造,全市仅剩无线电七厂一家继续生产收音机^③。

2. 自行车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最初两三年的恢复,到1952年,全国自行车产量即达8万辆。1957年的年产量增至80.6万辆,1965年升至183.8万辆,1976年达到668万辆,1979年更是突破了千万大关,创造了年产1009万辆的新纪录,跃居世界第一位。从1949年到1979年,全国共生产自行车8391万辆,自行车年产量增长720倍,平均每年递增23.5%。此后,1983年的自行车平均日产量相当于1949年年产量的5.4倍。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5亿辆,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④。

淄博市的自行车生产也颇具规模和特色。该市生产自行车的龙头企业是淄博自行车厂,该厂的前身是张店机械厂。1970年,张店机械厂转产自行车零部件,主要生产车圈、车把、车叉、挡泥板等。到1976年,该厂完成自行车零部件总产值90万元,生产车叉0.3万件、车把2.19万件、车圈2.46万件、挡泥板4.41万件、链盒15.2万件。这些产品均在省内销售,主要是供自行车修理用。

1977年上半年,张店机械厂组装了第一辆“泰山”牌ZA-21型自行车。同年6月,张店机械厂更名为张店自行车厂,当年共生产整车2665辆。1978年生产ZA-21型“泰山”牌自行车1.201万辆,质量分为60.25分,被国家一轻部批准为全国自行车生产定点厂家。这一年,该厂的产品品牌由过去试生产时的“泰山”牌改为“千里马”牌,质量达到省优质产品标准。在山东省4家自行车生产企业中,张店自行车厂位列第二。1979年,该厂生产自行车3.4万辆,质量分为72.337分;1980年生产9.082万辆,质量分为78.695分。1981年,该厂的自行车产量激增至17.0333万辆。

1981年5月,张店自行车厂更名为淄博自行车厂,成为市属一类区县级企业。1983年,该厂生产自行车26.0808万辆,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质量分平均达到82.894分,实现工业总产值3327.13万元,利税631.85万元。1984年,该厂对影响烤漆、电镀、焊接三大生产环节的工艺设备进行了全面改造,产品质量分平均达到91.84分,比1982年提高了15.65分。年底生产的“金鹿”牌自行车质量分更是高达98.6分,创造了山东省自行车行业的历史最好水平。从1978年到1985年,该厂累计生产自行车111.92万辆。

1979年到1981年间,淄博自行车厂开发并生产了ZA-30型和ZA-28型“千里马”牌自行车。其中,ZA-30型加壮了后座支架,加厚了车圈,车辐条也加大了一号,使其载重量大大提高,更适合农村运输的需要,因而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⑤。

为增强产品竞争力,经山东省政府批准,淄博自行车厂于1984年8月加入山东青岛自行车联合公

① 原淄博无线电七厂党支部书记王锦宝口述,曾高整理。

② 《淄博年鉴(1987年)》,淄博:山东省出版总社淄博分社,1987年版,第221页。

③ 相关数据来源于淄博盛康三转一响博物馆,张维杰整理。

④ 《新中国轻工业三十年(1949—1979)》(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⑤ 原淄博自行车厂副厂长袁本昌口述,向谊莹、王尉伊整理。

司,改产ZA-41型“金鹿”牌加重自行车,1985年共生产自行车22.0148万辆。同年,面对载重自行车市场日趋饱和的局面,该厂积极开展横向联合,与生产“凤凰”牌自行车的上海自行车三厂签订技术协作协议。在广泛吸收“凤凰”牌自行车优点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QE-85、QF-85型“天使”牌26吋、24吋男女轻便自行车,并于1986年5月正式投产,当年生产19万辆,完成工业总产值2999.6万元,实现利税358万元、利润41万元。产品质量也非常过硬,在全省自行车统一考核中,质量稳定提高率达100%。

截至1986年,淄博自行车厂拥有一个整车总厂和5个零部件分厂,共有职工2628名,主要生产“金鹿”牌载重自行车和“天使”牌两个系列30多个花色的轻便自行车,年生产能力为40万辆,成为山东省四大自行车生产基地之一^①。

3.手(钟)表生产

手表工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1955年,天津、上海先后试制出我国第一批国产手表,1958年开始批量生产。1956年至1958年,我国第一批手表厂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建立,1958年产量为1.65万只。1958年至1979年,我国累计生产手表9633万只,平均年递增率为40%。1979年,全国共有手表生产厂家44个,总产量达到1750万只,居世界第5位。1983年,全国手表产量达到3469万只,比1958年增长2101倍,年均递增35.8%^②。

淄博市的钟表工业初创于张店区的新华仪表厂。新华仪表厂本是一家生产其他仪表仪器的厂家,受当时全国上下“钟表热”的影响,于20世纪60—70年代引进技术,生产“巨星”牌挂钟。“巨星”的名称来源于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名称虽然没有正式注册商标,产品也没有达到批量生产规模,但在钟表紧缺的年代,该厂生产的这款挂钟在淄博仍广受欢迎。1984年4月,张店新华仪表厂与淄博无线电四厂合并,更名为淄博电视机厂,退出钟表生产^③。

“文革”结束前后,周村标牌厂一度生产过手表。周村标牌厂于1968年由周村钟表社和周村刻字社合并而成,主要从事钟表维修、钢笔修理、刻字及自行车和各种仪器仪表所用标牌的生产。该厂从1970年拥有第一台金属切削机床开始,逐年对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到1978年,发展到拥有17台金属切削机床,固定资产总值26万元,流动资金7.92万元。有了“金刚钻”,就想揽“瓷器活”。当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手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为了让国人尽快买得起、戴得上手表,国家曾规定,除天津“海鸥”牌和南京“钟山”牌两款粗码机芯手表之外,全国其他手表厂全部统一机芯生产,以上海的“上海”牌7120型号为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38家手表生产企业。周村标牌厂也抓住时机,利用本厂原有钟表修理人员的技术优势和切削机床的生产能力,着手生产自己的手表。1976年,该厂与青岛金猫手表厂取得联系,按重量购进金猫手表厂“降等”(即厂家挑选后剩下的二等品)的零配件,经过挑选、修理、校对等程序,把手表组装起来。

周村标牌厂最初把自己组装的手表定名为“萌芽”牌,但表盘和后盖都没有表标。20世纪70年代末,又改名为“胜利”牌。该厂从上海定制表盘,表标为大写英文字母“S”。表盖经本厂技术人员攻关,用冲压定型模具刻上“胜利”两个汉字。之后,周村标牌厂从西安仪器厂购进校表仪,对出厂的每块手表进行校对,保证每24小时走时误差控制在±30秒内,达到了国产手表“部颁标准”对误差的要求。1979年,该厂又缩小了手表的内衬圈,同时还推出了中型女表。

周村标牌厂的装表车间总共只有十几人,每月每人组装手表20块左右。由于手表属于试生产,没有经由有关部门注册,也没有列入商业部门的销售计划,大都是自产自销。其后不久,日本的石英电子

① 《淄博年鉴(1987年)》,淄博:山东省出版总社淄博分社,1987年版,第250—253页。

② 《新中国轻工业三十年(1949—1979)》(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页。

③ 《山东省志·电子工业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4页。

表生产技术进入中国后,对以统一机芯为主的中国机械手表生产造成极大冲击,全国机械制表业走入低谷,大多数生产厂家被淘汰,周村标牌厂也于1983年解散^①。

4. 缝纫机生产

我国能够真正独立地生产缝纫机,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三年恢复时期,上海、广州、青岛三地5家缝纫机厂先后恢复生产,1952年产量达到6.6万台。1957年,全国有7家缝纫机主机厂,产量达到27.8万台。1965年,全国的缝纫机厂增至22家,产量为123.8万台。1976年,全国的缝纫机产量提高至362.4万台。到1979年,我国以582万台的年产量成为世界上缝纫机产量最高的国家^②。

淄博没有民用缝纫机的生产历史,只是曾小批量生产过GA5-1型厚料工业缝纫机和GC1-2型中速平缝机,1980年的年产量为150台^③。这种缝纫机为凸轮挑线、摆轮钩线、双线锁式线迹和圆筒型缝台,主要供制鞋、皮件、蓬帆等企业缝制鞋底、皮箱、马鞍、载重袋及帐篷等之用。

二、“三转一响”工业产品消费情况

1. 总体情况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三转一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都是地地道道的奢侈品,能够消费得起的为数不多。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三转一响”才迅速得到普及。据统计,自行车的每百人平均拥有量,1952年为0.12辆,1983年为15.4辆,增长127倍;手表的每百人平均拥有量,1952年为0.07只,1983年为22.2只,增长316倍;缝纫机的每百人平均拥有量,1952年为0.05台,1983年为7.5台,增长149倍^④。在主要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三转一响”产品还不断出口国外。1980年,上海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外销创汇占其总产值的17.5%^⑤。

在计划经济时代,“三转一响”属稀缺商品,均由国营批发公司独家经营,价格也由国家严格把控,几十年来总体波动不大。1958年,由于经济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致使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遭到破坏,物价上涨幅度较大。1961年,淄博市物价总指数上升5.6%,是1950—1965年间物价上升幅度最大的一年。为了加强对物价工作的领导,1962年10月,新成立的淄博市物价管理委员会制定了《淄博市物价管理暂行办法》,从而使全市物价管理工作步入正轨。“文革”初期,国内各级物价管理机构被撤销,物价管理工作陷于瘫痪,许多商品供不应求,市场物价出现了失控状况。为此,196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各地切实加强物价管理,物价由此冻结。1967年,淄博市零售商品的物价指数是1965年的99.5%,1967—1969年3年持平,1970年后微升,但都未超过1965年的水平^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开始对物价体系和物价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从1979年起,淄博市逐步提高了主要农产品、副食品、烟酒的价格,1981年降低了国产机械手表的价格。通过一系列改革,部分不合理的商品价格得到理顺。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淄博市物价局根据国家和山东省的统一部署,放开了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使得

① 原淄博市周村标牌厂职工李长春口述,张维杰整理。

② 《新中国轻工业三十年(1949—1979)》(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107页。

③ 《山东省日用机械工业志(1915—1985)》,内部发行,1988年版,第87页。

④ 《建国三十五年来轻工业的光辉成就》,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⑤ 陈成琪、束金中:《上海轻工业生产应逐步转到以出口贸易为主的轨道上来》,《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⑥ 《淄博年鉴(1987年)》,淄博:山东省出版总社淄博分社,1987年版,第391页。

这些产品档次差价、质量差价、地区差价进一步拉开。商品经营权也逐步放宽,多数工业企业、商业零售企业、基层供销社都开展了兼营批发业务,有些个体户也开始介入批发,从而搞活了批发市场。据统计,1986年淄博市销售自行车131985辆,较上年增长33%;缝纫机37057台,较上年增长13%;录音机38483台,较上年增长29.5%;彩色电视机15662台,较上年增长98.6%^①。城市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显示,1986年淄博市每百户家庭拥有收录机54台、电视机107台、电冰箱16台、洗衣机75台,分别比上年增加24台、27台、8台、26台^②。自此,以“三转一响”为代表的“老四大件”开始向以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新四大件”转换。

2. 收音机消费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产的收音机成本高、价格贵,一般家庭很难消费得起。1955年,我国收音机社会拥有量仅为105万台,1957年为250万台。1960年后,我国收音机生产向简化、低价的方向发展。从1949年到1961年,全国在用的收音机数量增长了5倍多。1976年,我国的收音机生产成本比1966年下降了一半左右,有些品种甚至下降了2/3,收音机零售价因之大大降低,家庭普及率也逐年提高。到1976年,国内收音机销售量和出口量较之1966年增加了10倍^③。

在计划经济时代,要购买一台原装收音机绝非易事,而人们对收音机的需求又极为迫切,于是一些年轻人就尝试着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特别是在淄博,由于电子工业较为发达,带动了一大批无线电爱好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自学成才,能够维修、组装矿石、电子管、晶体管等各种类型的收音机,淄博民间名之曰“插”收音机。

曾任周村区文化馆馆长的刘洪早,其早期的收音机就是自己“插”的。作为一个专业戏曲艺术工作者,收音机对他来说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有需求却没有购买能力的他,早在1959年就学会了“插”收音机,并因此而成为当地较早拥有收音机的人之一。但是自己所“插”的收音机毕竟质量不硬,于是在淄博本地生产的收音机甫一投放市场,他就不惜本钱买了3台不同款式的收音机。时至20世纪70年代,他又费尽周折,托人从南方买来了更为先进的录音机。正是凭借着不断更新的得力工具,刘洪早开始了对淄博地方剧种五音戏的发掘和整理,完整记录了著名五音戏表演艺术家邓洪山先生的唱腔,为五音戏的保护和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④。

3. 自行车消费

在交通运输极不发达的年代,自行车既是代步工具,又具有运载功能,因此,多数家庭对自行车的需求比“三转一响”中的另“两转一响”更为迫切,自行车的人均拥有量在“三转一响”中通常也相对更高。1979年底,全社会自行车拥有量为8000万辆,平均12人拥有1辆;1983年,平均6.5人拥有1辆。中国生产的自行车从1953年开始出口,到1979年已销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9年这一年就出口自行车64万辆,创汇2637万美元。上海生产的自行车不仅畅销第三世界各国,而且从1980年开始进入美国市场^⑤。

同收音机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前,自行车由国家统购统销,销售价格也数十年波动不大。1957年10月,国务院及各省市公布的商品目录,对自行车实行控制供应,用户采用购货券方式购买。1962年初,国家明确规定,实行高价商品的原则是“品种少,收效大,群众易接受,副作用比较小”^⑥,自行车被列入其中。1972年,淄博市商业局强调,为了做到合理分配商品,控制外流,对自行车等有关商品实行购货

①② 《淄博年鉴(1987年)》,淄博:山东省出版总社淄博分社,1987年版,第314、74页。

③ 朱昶安《1949—1976年中国收音机的设计与演变》,北京印刷学院硕士论文,2016年。

④ 原淄博市周村区文化馆馆长刘洪早口述,曾高整理。

⑤ 《新中国轻工业三十年(1949—1979)》(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115页。

⑥ 叶鉴平主编《张店区商业志(1115—1986)》,淄博:张店区商业局,1988年版,第280页。

券供应。凭券购买的办法实行了近10年,直到1981年才撤销^①。改革开放后,自行车销售渠道和销售价格逐步放开。到1986年,自行车作为6种工业品之一,价格全部放开。

淄博本地生产的“千里马”牌自行车,在1985年之前销售情况非常好,一直供不应求。起初,产品由山东省五金交电公司全部合同收购,然后分配给各地市五金交电公司来厂提货,再由它们分配到各区县五金交电站零售。后来,淄博市内进城打工和跑买跑卖的人越来越多,对自行车的需求更加迫切,供需矛盾进一步增大。于是,淄博自行车厂与淄博市轻工业局的领导向省一轻工业厅提出请求,给淄博市留一部分自行车销售指标,以缓解当地群众急需,并照顾企业业务关系。省一轻工业厅同意留给淄博市每月200辆左右的自行车零售指标。淄博市将这部分零售指标印票发放,让本市群众凭票到淄博自行车厂的销售门市部购买。淄博自行车厂还加强了售后服务工作,在省内各区县五金交电站都选定“三包”服务部,对质量问题及时进行处理^②。

谢加沛至今清楚地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自己购买“千里马”自行车时的情形。当时他是生活在博山区农村的青年,经过两年多的积累,终于攒够了买自行车的钱,然后托亲戚搞到了一张“千里马”自行车的认购票。于是他乘坐公共汽车,从博山区辗转来到张店区,再一路打听着找到了淄博自行车厂,只见买自行车的人排起了长龙。经过漫长的等待,他终于买上了渴盼已久的“千里马”自行车^③。

除了淄博本地生产的“千里马”,长期以来最受淄博人追捧的还有青岛生产的“金鹿”牌自行车。但在物资紧缺、收入低下的年月,要买一辆“金鹿”谈何容易!据原淄博师专校长孙树木回忆,1970年,因工作变动,他急需购买一辆自行车。他大学毕业后的月工资为51元,一连15年没有涨过,而买一辆“大金鹿”(载重型)要花140元,买一辆“小金鹿”(轻便型)也要花120元。除了钱,还必须要有足够的工业券。当时每人每月只发两张工业券,凑工业券比凑钱还要难。经多方求助,他才凑够了120元钱和40张工业券,并如愿买到了一辆“小金鹿”自行车^④。

1973年,作为周村棉纺织厂职工的李式业,拿出积攒了几年的工业券,又向同事借了6张,再把家里养了几年的一头大肥猪卖掉,七凑八凑终于凑够了买自行车的钱和券。买自行车那天,他把钱和券包了一个大包,跑到周村区五金交电门市部,买回了梦寐以求的“大金鹿”。当他骑着崭新的“大金鹿”回家时,半个村子的人都跑去瞧新鲜^⑤。

淄博人之所以极力追捧“大金鹿”,是因为这款车经久耐用,不仅能代步,还能运输物资。当年周村区北郊镇农民侯光武就是凭着一辆“大金鹿”而脱贫致富。侯光武26岁那年,通过养猪卖猪积攒了100多元钱,买了一辆崭新的“大金鹿”。他每天骑着这辆自行车,带上50多公斤玉米,到离家5公里以外的淄川区昆仑镇去卖,以赚取每公斤2角钱的差价。1987年,他凭卖玉米挣的钱,在周村纺织大世界租下一个门头,做起了卖布的生意。在此后的11年里,他依然每天骑着那辆“大金鹿”上货、带货、送货,最终成为当地较早的“万元户”之一^⑥。

尽管当时在淄博几乎人人青睐“金鹿”牌自行车,但真正能够拥有的却只是极少数,因为要搞到这么一个“大件”,不仅需要钱和工业券,还需要“指标”。据1975—1980年间在周村区大姜公社代理党委秘书的耕夫回忆,那时各公社的自行车指标由区商业局分配,一年分配一到两次,每次只有五六辆。自行车由供销社经销,但是供销社一辆都不敢擅动,只有收到公社的介绍信,才能凭信卖出。这么稀缺的

① 《淄博市五金交电行业志》(下册),内部发行,1986年版,第192页。

② 原淄博自行车厂副厂长袁本昌口述,向谊莹、王尉伊整理。

③ 淄博实验中学纪委书记谢加沛口述,王雁整理。

④ 原淄博师专校长孙树木口述,张维杰整理。

⑤ 原淄博市周村棉纺织厂职工、山东省劳动模范李式业之子李跃训口述,张维杰整理。

⑥ 原淄博市周村区北郊镇个体户侯光武口述,王雁整理。

“指标”，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肯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新车不好买，有人就设法自己“插”自行车，即零零星星地买配件，凑齐了再找修自行车的人组装起来。但是“插”自行车也绝非易事，车架、链条、“葫芦”等都十分紧缺，只有在五金交电站才能辗转搞到。由于零件紧俏，连“大金鹿”的“器官”也成了炫耀的资本。在自行车市场上，常常听到卖家标榜“这可是原装的车架，原装的‘葫芦’，‘大金鹿’的，一动没动！”直到1983年以后，物资渐渐充裕，“大金鹿”一车难求的局面才开始改观^①。

20世纪80年代后，淄博市自行车数量急剧增长。据统计，1983年末，职工家庭平均每10户拥有自行车16.6辆。1985年底，全市自行车拥有量为95万辆，同年的全市人口总数为275.2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百人拥有自行车35辆^②。

4.手(钟)表消费

手表同自行车、收音机一样，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从全国范围来看，自行车、收音机的名牌产品较多，消费者的选择余地较大，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本地区生产的品牌。手表则不同，由于手表的生产工艺更精细，技术要求更高，因此全国生产手表的厂家虽然不少，但人们心中公认的名牌却为数不多，“上海”牌手表无疑是当时国人一致青睐的顶尖品牌。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4个佩戴手表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戴的是“上海”牌。至于全国手表的总体消费情况，1952年每百人平均拥有0.07只，1983年每百人平均拥有22.2只，增长316倍^③。从1973年开始，我国生产的手表开始出口国外，其中天津的“海鸥”牌、上海的“春蕾”牌、北京的“双菱”牌在国外市场销售情况较好^④。

同全国各地的消费者一样，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当时许多淄博人的美好理想和追求。据原淄博师专党委书记李金海回忆，他在1970年真正拥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上海”牌手表。当时，他每月工资只有43元，想攒钱买块手表谈何容易！后来还是妻子拿出自己积攒下来的钱，凑够120元为他置办了一块“上海”牌手表。这块表他一戴就是30年^⑤。

周村人李孔涛曾作为知青下乡一年零三个月，1976年回城时竟然分到了120多元钱，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年轻气盛的他向父亲提出想买一块手表，轻易不求人的父亲只好拉下脸皮，先找熟人想方设法弄到工业券，再托关系在周村百货大楼购得一块21钻的“上海”牌“人情表”^⑥。

同样作为下乡知青的李庆洪于1976年底进城参加工作。转过年来春节之前，他下乡的村里捎信说年底分成，他分得了110元钱。李庆洪随即添上10元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作为对自己的“慰劳”。这块手表他一直珍藏至今^⑦。

从上述例子可见，淄博人对“上海”牌手表可谓是有情有独钟。然而120元的价格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于是不少人只好退而求其次，购买价钱相对便宜的手表。比如周村标牌厂生产的“胜利”牌手表，产品分为快摆和慢摆两种，分别是17钻和19钻，每块价格分别是55元和60元。那时17钻和19钻的手表能卖到这个价钱实属便宜，因此虽然没有正式注册，仍然受到淄博人的喜爱，上门求购者络绎不绝^⑧。再如山东聊城手表厂生产的“泰山”牌手表，每块售价只有65元左右，也非常受山东人的欢迎。

① 原淄博市周村区大姜公社党委秘书耕夫口述，王雁整理。

② 《辉煌的三十五年·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1949—1983)》，淄博：淄博市统计局，1984年版，第407页。

③ 《建国三十五年来轻工业的光辉成就》，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④ 《新中国轻工业三十年(1949—1979)》(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⑤ 原淄博师专党委书记李金海口述，岳家锦、王尉伊整理。

⑥ 原淄博市周村区萌水公社下乡知青李孔涛口述，王雁整理。

⑦ 原淄博市文明办副主任李庆洪口述，张维杰整理。

⑧ 原淄博市周村标牌厂职工李长春口述，张维杰整理。

5. 缝纫机消费

新中国成立之初,平均每50户拥有1台缝纫机。到1979年底,全国缝纫机保有量为4420万台,平均每4.8户拥有1台。我国从1955年开始出口家用缝纫机,当年只出口了4000台,1965年增加到14.7万台,1979年出口整机增至49.6万台^①。

缝纫机的流通体制与自行车差不多,即生产企业只管生产,产品受政府经济计划管理部门管控,销售由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统一分配。根据职责分工,城市由商业部门统一管理,下属的五金和百货公司负责销售;农村则由供销社统一管理和销售。1954年,整个山东省仅销售6574台缝纫机。1958年后,缝纫机实行凭票供应。1962年,国家基于回笼资金的需求,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供应政策,缝纫机也被列入其中。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缝纫机开始成为热销商品,长期供不应求。据记载,1965年,淄博市仅供应124台,1971年和1979年分别供应1221台和3597台,到1985年,供应量达到17132台。在周村区,60年代每年的缝纫机供应数量只有100余台,1975年后上升到每年500余台。1978年,淄博市缝纫机百户拥有量,城市为51.9%,农村为17.5%;1983年,该市的缝纫机百户拥有量显著提升,城市为74%,农村为51%^②。

同手表、收音机相比,缝纫机是更具实用价值的“高端”消费品,尤其受到家庭妇女的欢迎,是妇女解放体力乃至脱贫致富的有力帮手。20世纪70年代中期,常年忙碌在外的周村棉纺织厂工人李式业为了减轻妻子独自料理家务的负担,卖了4棵大杨树,凑齐了所需的137.5元钱,买了一台青岛产的“工农”牌缝纫机^③。差不多同时,淄川区洪山镇马家庄的陈红梅托人买了台大连产的“前进”牌缝纫机,成为村里较早拥有缝纫机的家庭。淄川服装城兴起后,陈红梅周围买缝纫机的家庭多了起来。村民们在农闲时用缝纫机为服装城加工服装,以赚取一定的经济收入。1986年,在闺女满1岁时,陈红梅开始独立经营——加工一件长袖褂挣5分钱,加工一条长裤挣3分钱;加工西服要求高,利润也高,一件可以挣3块钱^④。

与手表中“上海”牌一枝独秀不同,缝纫机中多个品牌差别不是特别明显,人们的选择范围比较宽泛。在临淄区路山镇小张村的王天兰眼中,最好的缝纫机牌子是上海的“蜜蜂”牌,其次是天津的“牡丹”牌,再次是青岛的“工农”牌。1979年,一台“蜜蜂”牌缝纫机要卖150多元,“工农”牌也得120多元。她父亲经过权衡,花146元为王天兰买了一台“牡丹”牌缝纫机^⑤。

在周村区,由于纺织业比较发达,带动了缝纫业的发展和缝纫机的消费。据记载,仅1970年前后的5年间,周村城乡的家用缝纫机就增加了2000余台。另据淄博市周村区档案馆馆藏《周村区商业志》所收周村百货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周村缝纫机的销售量为:1966年104台,1980年1192台,1985年1957台,连续多年稳居淄博市各区县之首。由于市场需求量大,周村百货公司需要不断从上海、天津、青岛等地调进缝纫机。

三、余论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三转一响”在全国一直是炙手可热的消费品。但从80年代

① 《新中国轻工业三十年(1949—1979)》(上册),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106—107页。

② 《辉煌的三十五年·淄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1949—1983)》,淄博:淄博市统计局,1984年版,第11页。

③ 原淄博市周村棉纺织厂职工、山东省劳动模范李式业之子李跃训口述,张维杰整理。

④ 原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马家庄村农民陈红梅口述,王尉伊整理。

⑤ 原淄博市临淄区路山镇小张王村农民王天兰口述,王尉伊整理。

后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三转一响”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如今,打着特殊时代印记的“三转一响”已经变为保存文化记忆的工业遗产。

“三转一响”工业文化遗产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民族工业艰难历程的有力见证,也是诸如淄博这样的老工业城市服务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生动记录。它承载了一代中国人的民族情怀和青春记忆,值得永久保护和广泛传承。

当前,全国人民对于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形成共识,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人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化特别是近现代工业文化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或者认为其离当代太近,尚不足以言历史和文化,或者认为其代表的是积贫积弱的中国,避之犹恐不及。然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需要完整的历史谱系和真实的文化记忆,无论是繁荣与兴盛抑或是衰弱与贫穷,都凝聚着一个民族艰辛探索、奋发进取的奋斗历程,都蕴藏着不容遗忘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因此,提高民众对近现代工业文化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已充分认识到保护工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性。2020年6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发布《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该方案称,当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相对薄弱,亟需采取措施进行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老工业城市应从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角度出发,立足城市发展实际,学习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探索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打造“生活秀带”的有效路径,并以此促进城市更新改造,探索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理想出发,还是从响应国家号召、以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促进城市转型发展的现实出发,都有必要切实加强“三转一响”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要通过采取扩大宣传、提高认识,摸清家底、加强研究,树立样板、重点扶持,拥抱高科技、催生新业态等一系列举措,科学保护并合理利用“三转一响”工业文化遗产,使“三转一响”这棵老树再发新枝,更好地服务于城市的新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责任编辑:裴传永]